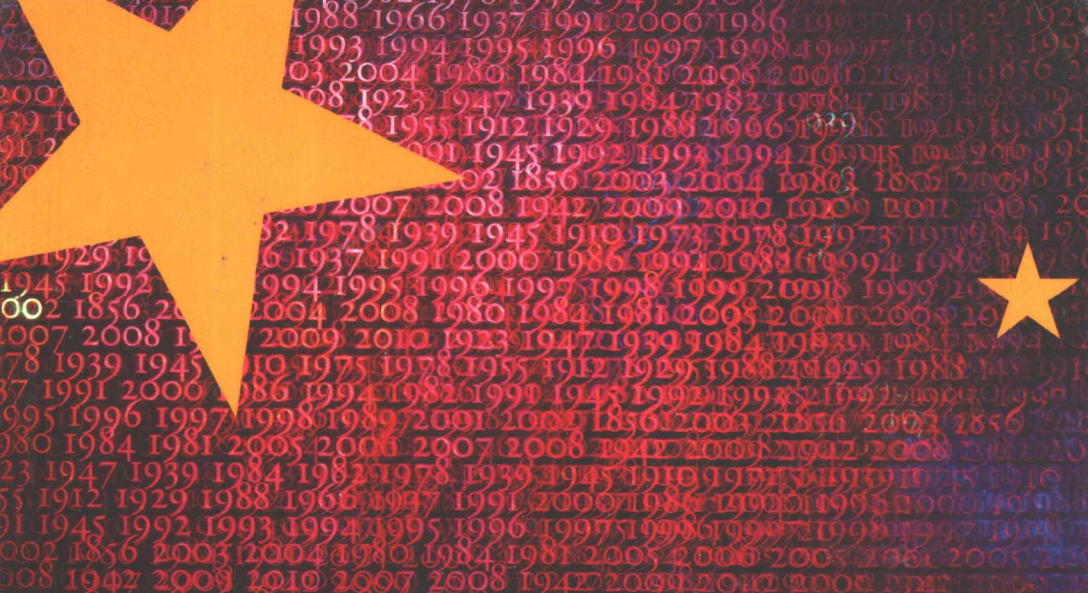




中国的追赶型发展

货币政策与经济重构

主编 [德] 汉斯约尔格·赫尔
[德] 阿尔布莱希特·隆美尔
[中] 何泽荣

3



中国的追赶型发展

货币政策与经济重构



主编 [德] 汉斯约尔格·赫尔
[德] 阿尔布莱希特·隆美尔
[中] 何泽荣

西岸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追赶型发展:货币政策与经济重构/(德)赫尔等主编.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

ISBN 7-81088-062-4

I. 中... II. ①赫...②隆...③何... III. ①货币政策—中国—文集②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①F822.0-53②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055 号

中国的追赶型发展:货币政策与经济重构

主编:[德]汉斯约尔格·赫尔

[德]阿尔布莱希特·隆美尔

[中]何泽荣

责任编辑:涂洪波

封面设计:郭海宁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xcpress.com/
电子邮件:	xc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1/32
印 张:	7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88-062-4/F·056
定 价:	20.00 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言一

前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
柏林与勃朗登堡州中央银行行长
Klaus-Dieter Kühbacher

大约三年以前，即 1998 年年末，原柏林经济学院院长孔泽 (Juergen Kunze) 教授问柏林与勃朗登堡州中央银行行长本人是否有意参与该校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已有的多年合作，并建议我行参加在欧洲和成都首次召开的有关货币政策的会议。作为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理事会成员，我已多年负责联邦德国货币政策的工作，因此我自然乐意将德国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参加会议的中国合作者。我特别想向他们强调以下观点：货币政策的最高目标在于稳定物价，这对有效配置资源和防范通常使低收入阶层受到损害的社会不公平至关重要。我与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政府及西南财经大学的代表对此进行了无数次交谈与讨论，其中也涉及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区——欧元区过去如此，当今局部还是这样——实施以稳定物价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所特有的好处和困难。

人们通常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律赋予的不屈于政治指令的独立性视为德国成功维持物价稳定的关键。因此，联邦银行法常常被当做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法规的参照。例如，欧洲中央银行

虽然并非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完全翻版，但在很多方面却也仿照后者。所以，我在交谈与讨论中特别着重阐明，德意志联邦银行强有力的地位并非完全来自法律确立的独立性。这从以下一点也可以看出：与欧洲中央银行不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不是由宪法确立，而是以法律为基础，而法律只要具备简单多数就可改变。因此，德国货币政策的成功实施最终取决于早已深入德国民心的“稳定文化”，它是德意志联邦银行决策与行动自由的保障。当然，德国上个世纪两次币制改革的经历想必留下了烙印。

毫无疑问，中国货币政策所处的经济环境与欧洲有诸多不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深刻的变革，速度本已可观的转型必将加快步伐。这里虽然不直接涉及货币政策，但“以增长为导向”的压力恐怕会加大。然而，更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减轻结构调整的负担。我曾经出任过一个前东德联邦州的财政部长，现在负责原东德中心部位的联邦州中央银行的行长，因此深知物价与货币的稳定对实现经济与社会巨大变革的重要性。

尽管存在以上简单描述的差异，但中国中央银行在改革的进程中必将使用更为有力的市场经济调控机制。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这已经局部实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其货币政策战略的认识却只能靠揣测。这一点想必会很快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汇率体制将变得更加灵活，物价变化将失去某些确定的基础。这样一来，货币政策将负起主要责任，确定适度的货币供给量，从而既不阻碍经济增长、又不助长通货膨胀。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对此西方工业化国家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保障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的货币政策战略至关重要。其具体内容则是未来货币政策的研究课题。

我认为这本论文集的文章就以上提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做出了回答。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的答案是最后真理，但我仍然希

望这本书能给我国和中国对此问题的继续探讨带来启发。

最后，我再次感谢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对我们的热情邀请和接待，特别感谢该校原任校长王永锡教授和现任校长王裕国教授。同时，我希望能够继续这一使双方都能获益的合作。本书的出版是双方合作的第一个明显的、在我看来能够展示于众的成果。

序言二

原四川省副省长 李达昌

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光。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供应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它还承担着银行监管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步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历程。随着改革不断取得成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过去，中国的中央银行具有双重政策目标：首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然后才是稳定货币。中央银行在各省、市设立分行。当时中国的中央银行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确定各个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而商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则是国有企业。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大为减少，不再按省、市设立分行，而是以几个省、市为单位设立分行。同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也逐渐转向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间接调控。更为重要的是，人民银行把它的货币政策目标锁定在稳定货币这个单一的目标上。

通过大量的改革，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基本结

构仍处在变革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还必须在货币政策和信贷监管等一系列方面进行改革，这就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先进经验。我们对德意志联邦银行过去在德国，以及今天在欧元区内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具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知道，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今天的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为世界所公认，所以在中国人们把德国的中央银行体系与货币政策看做一种基本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成功地扩展到了整个欧洲货币联盟，而且对中国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想强调的是：每年都定期在柏林和成都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为双方的学者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这本以金融改革为主题的论文集正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论文集分别以中、德文本出版，对此我谨对双方的专家学者表示祝贺。我相信，该论文集的出版对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承办本次研讨年会的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作为柏林经济学院和柏林与勃朗登堡州中央银行的老朋友，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同事们有机会直接和德国的专家、教授就中国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直接的交流。我荣幸地欢迎柏林与勃朗登堡州中央银行行长克劳斯·库巴赫先生、副行长乌尔利希·普鲁士先生以及柏林经济学院的各位教授来到西南财经大学参加研讨会。

借此机会我还要对代表柏林与勃朗登堡州中央银行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库巴赫行长和普鲁士副行长为双方合作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各位长期以来一直与西南财经大学

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柏林经济学院的各位教授，特别是格尔特·库尔克教授，他在十多年前就首先开始了与西南财经大学的合作。最后我还要感谢柏林经济学院的前任校长于尔根·孔泽教授和现任校长弗朗兹·希尔伯特·李格尔教授，感谢他们对西南财经大学和柏林经济学院的两校合作关系所做的实际支持。

序言三

柏林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Franz Herbert Rieger

西南财经大学和柏林经济学院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两校之间的合作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初在柏林经济学院内部的第一个倡议者 Gerb Kulke 教授。两校自合作以来已经经历了三任校长。在西南财经大学方面首先是由刘诗白校长发起, 然后经王永锡校长继续发展, 现在是王裕国校长。在柏林经济学院则首先是 Edgar Uherek 教授, 然后是 J. Kunze 教授, 现在是本人。无论校长是谁, 两校合作一直都有积极的进展, 特别是在 J. Kunze 教授的任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和柏林经济学院均为专业的财经院校。因此, 经济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是两校的合作领域。在本科教学方面, 两校进行学生交流; 在研究生教学方面有两项内容: 一是在我校举办的德中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项目, 二是由德国发展基金积极参与的“宏观经济政策”进修课程。双方最重要的研究项目涉及经济体制转型、货币政策、国家社会保险体系以及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校在诸多领域里进行教学与科研的合作, 并定期发表文章, 涉及商业教育的国际比较 (1997)、转型经济和货币政策 (1996、1997 和 1999) 等方面。

在所有的合作项目研究中以货币政策研讨的合作最为突出。五年来一直定期在柏林和成都举办的货币政策研讨会就是这一持续合作的典型例子，本论文集正是双方毫无偏见的科学合作的结果。在此我要感谢柏林与勃兰登堡州中央银行，它不仅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伙伴，而且资助了本书的出版。本书为科学讨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富有成果的跨文化合作的例证，我祝愿它得到应有的关注。

序言四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柏林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柏林与勃朗登堡州中央银行

国民经济部部长、博士

何泽荣

Hansjörg Herr

Albrecht Somm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无数事实表明这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应变能力。首先是私有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增加，而国有经济所占的比例却下降到30%左右。国家放弃了对价格的管制，除极少数特殊商品外，市场机制已经成为决定价格的主要力量。然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却相对较小，其原因在于国家还保持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大大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在经济体制的急剧变革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也不例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深圳和上海建立起了证券交易所——这在几年前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虽然不能排除股票交易中的投机成分，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交易繁荣的市场。虽然到目前为止股票市场为企业筹集的资金所起到的作用还很小，可是随着建立养老保险体系计划的逐步实现，这势必将为市场带来充裕的资本，从而使资本市场成为企业继银行贷款之后的第二大融资渠道。相反，银行贷款的变化却

很小，四大国有银行的地位依然无人撼动。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绝不能因为它还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得出中国的转型将停滞不前的结论。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一如西南财经大学和柏林经济学院在过去所举办的各次研讨会那样，仍然是本次研讨年会的主旨。这本论文集由所有与会人员对自己在会上的发言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汇集而成。

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主要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及金融体系的改革问题。Hansjörg Herr 教授的论文探讨了中国在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同时一直存在着商业银行对企业发放软贷款的现象。任其下去，这种现象势必造成银行的不良债权和资源分配扭曲，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他认为巩固中国的银行体系似乎不能通过净化银行资产（存量问题）来实现，而应该着眼于消除造成银行信贷亏损的原因，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相结合。何泽荣教授等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由于利率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障碍和利率刚性，因而现行的利率政策效率低下，且中央银行规定的存、贷款利率的变化落后于市场的变化。他们建议的改革方案是逐步实现利率自由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应逐步转变为透过货币市场的间接调控工具。

中国商业银行的大部分呆账、坏账是银行监管不够充分的结果。由于中国加入 WTO 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向外资信贷机构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剧了中国加强银行监管的紧迫性。Ullrich Preuß 先生在他们的论文中介绍了巴塞尔委员会于 2001 年 1 月推出的对银行自有资本标准进行改革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并对新的银行监管标准做了评估。

中国的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 WTO 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应

对这样的挑战，这是卿淑群教授论文的内容。她的观点是：在国际性大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在入世后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应该扩大规模、与国际惯例接轨并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服务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资大银行进行竞争。

二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Albrecht Sommer 博士分析了中国自 1994 年以来实行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根据最新的汇率理论对中国中央银行未来的汇率政策的各种可能走向进行了比较研究。基于以上分析，Sommer 博士得出以下结论：在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以及中国加入 WTO，必须进行背景条件下，采取一个更为松动的联系汇率制度对中国更为有利。但是，这一政策的转变应循序渐进地进行，要和巩固银行系统的改革分别开来，同时要逐步放宽现有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Gerd Kulke 教授的论文主要讨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他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新古典主义的债务循环假设和凯恩斯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对比，由此得出结论：中国过去一直在实施一种混合战略，即一方面实施以积累充裕的外汇储备为目的的明显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另一方面则以建立经济特区为主要手段，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Gerd Kulke 教授论证了这种特殊的发展战略对于启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同时也比较了中国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启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差别，认为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邹宏元教授的论文也同样关注这个问题。他在论文中回顾了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的不同阶段，进而分析了由于中国加入 WTO 而可能造成外国直接投资局部回流现象。

三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重构与所有制的改革问题。中国的多元所有制结构是否也会出现当初东德对大型联合企业实行私有化

那样的结果，使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瞬间崩溃，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Gert Bruche 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对多元化经营企业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然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不同调查方法本身存在着缺陷。可是从理论上讲，下述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多元化经营企业无论是从静态的角度看，还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在实现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都具有比单一经营企业更大的优势。Jan Prieue 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讨论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造问题。尽管中国不会考虑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是 Jan Prieue 教授还是指出：私有化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为了避免可能危害整个转型过程顺利的社会性变化，他主张逐步实现私有化——虽然这样会损失很多时间。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曹廷贵先生描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思想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发生变化的历程。他揭示了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对外开放政策和引入市场经济手段融合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在他看来，只有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之后，才谈得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目 录

序言一	Klaus - Dieter Kühbacher(1)
序言二	李达昌(1)
序言三	Franz Herbert Rieger(1)
序言四	何泽荣 Hansjörg Herr Albrecht Sommer(1)
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和改革压力	Hansjörg Herr(1)
论中国的利率政策	何泽荣 赵静梅(34)
巴塞尔协议 II ——国际银行监管的新制度	Rainer Naser Ullrich Preuß(48)
加入 WTO 后的中国银行业	卿淑群(58)
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利与弊	Albrecht Sommer(65)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Gerd Kulke(105)
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	邹宏元(117)
多元化公司——三十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	Gert Bruche(130)
从企业改革到广泛私有化——中国国有企业之命运	Jan Priewe(157)
关于邓小平思想	曹廷贵(187)
中文版后记	(205)

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 和改革压力

柏林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Hansjörg Herr

一、导论

中国的改革走过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成功历程。成功的显著标志是真实国内生产总值（BIP）的高速增长。增长率虽有波动，但却能保持在高水平上（见图 1）。经济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人均收入的强劲增加，缩小了与西方工业国之间的福利差距，这使得中国不同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包括独联体各国在内的中、东欧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通货膨胀虽然猛涨，但是最终都得以抑制。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虽有下降，但从 70 年代末以来从未陷入萧条。90 年代末中国出现轻度通货紧缩，同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下降，但两者均在 2000 年得以克服（见图 1）。不过，新的风险又威胁着国际经济，中国同样也无法回避这些风险。